

第十六章 第一次车臣战争

开战原来这么容易！俄罗斯轻而易举地被卷进了车臣的战斗。尽管俄罗斯所有的政治家年年都在重复着“可别发生战争啊”。而且直到今天我们也不知道这场导致鲜血横流、蒙羞含辱的战争为什么突然就开始了？谁是始作俑者？我们究竟是如何险些失去车臣的？

小民族的杀手锏

与车臣的关系一直困难不断。在北高加索那里，人们既没有忘记 19 世纪征服车臣时的腥风血雨，也没有忘记 1944 年斯大林下令把所有车臣人一个不留地迁出了他们的故土。中生代车臣领导人都是在流放地出生的，而且每个人的家庭中都有亲人死于被迫迁移之时。车臣人更觉得委屈的是没有对他们表示过歉意，他们就这样依旧是一个令人怀疑的民族。

甚至还是在苏联时期，车臣人就抱怨故意不让他们从事主要工业部门的工作，也不让他们进入科学领域。受信任担任车臣 – 印古什自治共和国领导职务的只是外来人。在这个不发达的萧条地区人们无事可做，男人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去挣钱。1991 年共和国的失业者已有 30 万人。

因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而暗怀不满在这个民族的性格和传统中不断沉积起来。这里的人们总是轻易地拿起武器，随时准备以武力证明自己的正确。而且这里的人们也没有忘记曾和俄罗斯作战的民族英雄沙米尔的遗训：“小民族应该有杀手锏”。

在 1990 年 11 月的日子里，在国内发生剧烈变化的浪潮中，格罗兹尼成立了车臣人民全国大会。莫斯科很少有人关注这一事件。

车臣人选举他们引以为豪的同族人——扎哈尔·杜达耶夫担任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是战略空军师师长，有在阿富汗作战的经历。他的童年是在哈萨克斯坦的流放地度过的，后来得以进入飞行学校，又在加加林空军学院毕业，获得过许多奖励。当杜达耶夫被授予将军军衔时，举国上下的车臣人都欢呼雀跃——这可是第一个车臣人的将军啊！

总的来看，本打算让扎哈尔·杜达耶夫起个代表作用。在车臣大会成立的背后是另外一些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的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后来成为杜达耶夫的副总统的泽利姆汗·扬达尔比耶夫。杜达耶夫没有顺从让他起代表作用的意愿，他退役了，全家搬到格罗兹尼，埋头于政治。

但是，把车臣引向和俄罗斯进行战争的第一步并不是杜达耶夫迈出的。

1990 年 11 月，当时还是统一的车臣 - 印古什的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共和国国家主权的宣言。在这个宣言上签字的是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苏共车臣 - 印古什州委第一书记多库·扎夫加耶夫，后来莫斯科依靠的就是他。

正是这位党的官员扎夫加耶夫宣布车臣 - 印古什为主权国家。宣言谴责了“对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的种族灭绝行动”，并声称“共和国为自己保留要求补偿 1944 至 1957 年给共和国及其人民带来的精神和物质损失的权利”。

宣言中还提出了要把现在属于北奥塞梯的普里格罗德内区和弗拉季高加索的右岸部分归还给车臣 - 印古什的问题。而把在 1957 年作为补偿划给车臣 - 印古什的三个区——谢尔科夫斯克区、纳乌尔斯克区和卡尔加林斯克区归还给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问题自然没有被提及。

以多库·扎夫加耶夫为首的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设立共和国总统职位的决议。这个职位扎夫加耶夫是为自己准备的，但却让杜达耶夫占去了。

是杀害还是不幸事件

在 1991 年 8 月的那些日子里 车臣 - 印古什当局支持紧急状态委员会。与此相反，以杜达耶夫为首的车臣人民大会则站到了叶利钦一方。

车臣民族运动思想家之一泽利姆汗·扬达尔比耶夫因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而被扣押 但很快就被释放。但是 扬达尔比耶夫被捕为在格罗兹尼举行群众集会提供了口实。

全共和国的人被召集参加集会。他们丢下工作，从最偏远的村庄赶到这里来。参加集会的人们冲进苏共格罗兹尼市委的办公大楼，把它变成了自己的指挥部。旁边就是地方克格勃的大楼 它也被占领了。后来人们说 领导占领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的似乎是警察比斯兰·甘塔米洛夫 他在第二次车臣战争时成了莫斯科的主要支柱。

当时任俄罗斯克格勃主席的维克托·伊万年科对我说：

“在格罗兹尼克格勃大楼被占领时可以进行选择 或者采取武力行动，或者和杜达耶夫谈判。但是我没能和叶利钦联系上 没能获得他的批准 他正在索契休假。想像一下 在国内发生这种事情时，特工部门的领导人却不能和总统联系上！我没有采取可能导致流血的武力行动，现在我对此事依然抱憾。当时只需花少量流血的代价就可以制止住激进分子。的确，只靠讨伐行动不可能制止那里发生的事件。在我和杜达耶夫会见时，如果我们的伙伴们哪怕能把我们的卡片箱运出来，把克格勃地方情报人员的卷宗运出来也好啊……”

专家们后来一次又一次追溯到这个问题：当时是不是应

该以少量流血的代价把格罗兹尼的暴乱镇压下去，从而避免后来发生的那些事呢？

但是仅仅靠流一点血恐怕无济于事。那些日子在格罗兹尼的见证人们目睹了从共和国各个地区聚集来的车臣年轻人双眼冒着怒火。考虑到车臣人性格中的民族气质就不难断定，他们宁死也不会交出杜达耶夫。

维克托·伊万年科在格罗兹尼之行后给叶利钦写了一份报告：

“大部分居民 首先是车臣族的居民 支持罢免车臣 - 印古什共和国最高苏维埃……”

“在这种条件下 我们认为只能通过政治解决的途径走出危机，因为武力的办法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暴力升级和重大牺牲 损害俄联邦政策及其领导人的威信。”

从车臣事件一开始，叶利钦就表现出一种奇怪的消极立场。看得出，总统在过问这些事情时是勉为其难的。似乎直到最后一刻他也没有意识到，要解决北高加索出现的问题需要认真努力，首先是他本人需要这样做。在最紧要关头的那些日子里 他确实像是失踪了。他时而是去休假 给他打不通电话；时而一连几天躺在医院里做计划中的手术。当准备在车臣进行一场军事行动时，他正在接受已经变形的鼻腔黏膜的矫正手术。

大概这里首先表现出来的是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对居住在南方的各族人民的那种典型的轻蔑态度，那些民族被看成是不需要认真对待的天生的惟利是图者。在车臣危机的第一阶段完全可能通过和杜达耶夫进行开诚布公的谈判来解决问题。但是为此需要邀请他到克里姆林宫来并充满敬意地和他进行谈话。叶利钦断然拒绝这样做，谈判的机会也就错过了。

1992年7月杜达耶夫给叶利钦写信，建议把就石油事务进行合作谈判作为第一步措施：

“回顾过去 在 8 月叛乱和苏联解体后最初的几个月，我们双方都应该承认，各方都犯有错误，有过令人遗憾的失策。而且我认为互相不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对该信件讨论范围之外的我们双方关系中积累的所有问题 我认为必须采取合理的实际措施 以使双方在经济领域的立场尽快接近，从而逐步达成政治协议。”

答复并未随之而来。

整个车臣的历史是一部充满错误的历史，每个错误都使局势更加恶化，以致俄罗斯政权很快就陷入了绝境。要知道，最初还是有可能在完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和车臣人达成协议的。

9 月 4 日 杜达耶夫宣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被推翻 并发布车臣应该独立，应选举自己的议会和总统。让印古什人去建立自己的共和国吧。

9 月 6 日，参加集会的人占领了最高苏维埃大厦。格罗兹尼市苏维埃主席维塔利·库岑科丧生。

斯坦尼斯拉夫·戈沃鲁欣领导的一个研究车臣事件的议会委员会提出了报告，对格罗兹尼市苏维埃主席之死是这样说的：“许多证人证实 库岑科是被用最残忍的手段残害致死的——他被从窗户抛了出去，而且不单纯被抛出去（那里有刻花玻璃）而是用库岑科的身体砸碎玻璃后扔出去的。”

前车臣 - 印古什检察长亚历山大·普希金对这些悲惨事件的说法则相反：

“市苏维埃主席库岑科当时决定从窗户跳出去。虽然这是一楼 但是它下面还有一个夹层 总之相当高。

“对直接见证了此事的人们进行了讯问。他是脚朝下落下去的 想要跳下去。但是如人们所说的 他的手没有及时松开 脚勾在了一个东西上。他很魁梧 而且已经上了年岁——快 60 岁了——没有能收起身体就摔下去了，头撞到了地上。

他在失去知觉的情况下躺了几天就去世了。”

也许检察长更了解这场悲剧的实际情况，维塔利·库岑科是没有跳好才摔死的。但是 如果一位市苏维埃主席、一个年岁已经不小的人由于害怕不速之客而从窗口跳了下去，当天在格罗兹尼究竟出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应该是感到十分恐惧的。

两位飞行员的会面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新任主席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飞抵格罗兹尼。人们认为 作为车臣人 他会更好地弄清楚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哈斯布拉托夫同意解散共产党官员们领导的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反正已经是谁都不服他们管了。

按照莫斯科的指示组成了一个新的政权机构——最高临时委员会，领导它的是苏联人民代表列恰·马戈马多夫。他是原州委第二书记，后来担任过共和国国家物价委员会主席。

这是莫斯科第一次尝试把自己人安插到格罗兹尼。此次尝试就像后来所有尝试一样，结果是徒劳无益。共和国的实际权力转入杜达耶夫之手。作为军人，他立即就开始组建自己的近卫军。

当时叶利钦委托没有职务之累的副总统亚历山大·鲁茨科伊管理车臣事务，这也并非最佳选择。

鲁茨科伊飞抵格罗兹尼 会见了杜达耶夫 看起来两位将军已经达成了协议。但是回到莫斯科后，鲁茨科伊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车臣简直就是盗匪猖獗。这与实情相去不远，但终究需要和格罗兹尼的某个人进行谈判。鲁茨科伊连还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都一脚踢开了。

作为回应 蒙受侮辱的杜达耶夫在车臣宣布了动员令 实际上这是对莫斯科宣战。人们开始武装起来，共和国内开始

生产自己的冲锋枪。格罗兹尼监狱暴动造成大批囚犯越狱并组织了战斗队。

杜达耶夫想和叶利钦谈判，他认为俄罗斯的元首应该亲自会见他这个全民族的领袖，但是人家根本就不打算和他对话。作为车臣人，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的意见是很有意义的，但他甚至根本不想听杜达耶夫说什么。莫斯科要求放下武器和解散非法武装组织，但是谁都不打算执行莫斯科的命令。

10月27日杜达耶夫当选车臣共和国总统，尽管这次选举未必称得上是民主的。11月1日杜达耶夫下达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车臣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

北高加索局势的行家《消息报》特派记者伊琳娜·杰缅季耶娃后来说：

“杜达耶夫是不是一个狂妄的分离主义者呢？我认为是我们把他变成了这个样子的，而在当时他是没有任何纲领的。他不过是退役了并想要为自己的人民服务。他作为一个军人就意味着在某些方面是有局限的，他对人民有一种表面化的、有些忧郁浪漫的想像……但是我想，就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形势会把他赶到哪里，他要期待俄罗斯的什么回应。我当时有一种明确的感受，就是如果叶利钦向他伸出手，他们就可以达成协议，也会找到关于车臣的谈判方案。但是俄罗斯装聋作哑、耍滑头、推太极，让一个并不很沉着稳重的将军发起狠来……”

11月8日，叶利钦在鲁茨科伊的坚持下，签署了在车臣—印古什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在这个命令发布之前，格罗兹尼政治斗争的结局尚不明朗。这道命令动摇了亲俄罗斯政治家们的立场，因为车臣人认为这道命令是企图重新打压他们，于是他们拿起了武器。

最令人吃惊的是，曾经有许多正式文件是针对车臣局势

而发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无法找到这些文件的作者。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作者，因此很难准确地回答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切都是谁想出来的？每一步都越来越缺乏理智。

鲁茨科伊要求采取军事行动 整顿共和国里的秩序 解散武装队伍和逮捕杜达耶夫。内务部和克格勃的人说，这是不可能的。警察和军人都不想管这事 他们明白 流血的全部责任将会落到他们头上。

然而，特种部队和内务部队的兵力还是从三方进入了车臣。但是杜达耶夫的战斗人员和当地居民封锁了机场，投到格罗兹尼的部队没能集结起来。行动小组的领导人从格罗兹尼报告说 使用武器会造成不良后果：“有可能爆发后果严重的事件，将会使北高加索的总体局势极其复杂化……”

杜达耶夫宣布共和国进入战时状态 分发了武器 命令要把每座房屋都变成堡垒。当地警察宣誓效忠于杜达耶夫。

在这种情况下，杜达耶夫对莫斯科的行动小组表现得非常理智。车臣人给士兵们提供食品并且建议和解。

11月9日，在格罗兹尼为杜达耶夫就职举行了规模宏伟的群众大会 有10万人参加。车臣人民大会执委会号召把莫斯科变成“灾难地区”。于是就有了已经向莫斯科派出车臣恐怖分子的最初的传言。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要求在车臣停止行动并取消紧急状态。

他的助手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不断给内务部长维克托·巴兰尼科夫、国防部长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和联盟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瓦季姆·巴卡京打电话。

“已经达成协议不在车臣集结和使用军队 也就是要停止执行叶利钦关于紧急状态的命令。在电话的间歇中还不断地传来骂娘的粗话：

“‘为什么？干什么啊 如果开战可就是成百上千条生命

呀！那里彼此间争吵和打架的所有派别和集团都联合起来对付俄罗斯人了。作战人员已经在召集妇女和孩子，为的是在部队开来时将他们赶到自己的前面白痴！’

“他对我说：‘刚刚和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通过话。我立刻就明白了，打电话是徒劳无益的，他喝得酩酊大醉，醉得舌头都不听使唤了。’

“戈尔巴乔夫给哈斯拉托夫打电话，后者要求‘整顿秩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告诉他：别抽风。我想建议现在所有该来的人都来开会，但是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感到‘不舒服’，明天10点我们再开会……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11月10日没有能开成让叶利钦参加的关于车臣问题的会议。后者在所有的‘节日’里都在喝酒……”

杜达耶夫的威信在下降

1992和1993年，俄罗斯忙于盖达尔改革，还顾不上车臣。莫斯科实际上既承认了车臣的独立地位，也承认了杜达耶夫的总统地位。杜达耶夫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种有利的形势。他只想和叶利钦本人谈判，而且，如果俄罗斯的总统对车臣的将军表示关注的话，他准备达成妥协。

1991年秋，《红星报》的记者尼古拉·阿斯塔金采访了杜达耶夫将军。

“扎哈尔·穆萨耶维奇，在军队您一直被认为是很棒的。通常把落后的部队交给您，而您能把它们带入先进行列。您是如何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

“是的，交给我的基本上都是难带的驻防军。无论是在西伯利亚，还是在乌克兰或是波罗的海沿岸国都是如此。但是我总能把他们带成优秀部队。我曾是最优秀的师级指挥官

.....军队给了我很多东西，实际上是给了我一切。但是我的民族对军队持否定态度。这首先是因为部队把我们的年轻人变坏了。我们的年轻人天生就是军人。比如，他们不爱吃脂油。那不是因为它脂肪多，而纯粹是因为这些青年山地居民身体的特质。在军队里人们强迫他们吃脂油，强迫他们列队，清扫别人的粪便.....”

“目前在共和国组建了 6.2 万人的民族近卫军和 30 万民兵。杜达耶夫坦诚地说：“我们正在着手制定防御机构和防御体系法。”

“这是否说明您在备战？”

“俄罗斯对车臣事务的任何武装干涉都将意味着新的高加索战争，而且是残酷的战争。最近 300 年中一直教导我们迁移。这种迁移不是单个进行，而是整个民族的迁移。还有，高加索其他的民族也不会袖手旁观的。”

“您想说，如果发生武装冲突就将会是没有规则的战争吧？”

“是的 这将会是没有规则的战争。而且请您相信 我们不会在自己的领土上打仗。我们要把这场战争引到它的策源地.....”

1992 年 3 月 31 日 车臣议会宣布 根据司法管辖权接管位于共和国领土上的所有军队、武器和军事设施。

1992 年 4 月 1 日，杜达耶夫要求所有的军人及其家庭成员撤出车臣领土。但他宣布军队应该把一半设施留给他，否则他不会放走军人的家人和他们的财产。

杜达耶夫和代表俄罗斯国防部的斯特罗戈夫中将签署了《关于车臣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之间撤军和划分财产的协议》。

1992 年 6 月初，联邦军队结束了从车臣领土的撤军。部署在这个共和国领土上的所有武器都留给了杜达耶夫，其中包括步兵使用的火箭发射器，260 架教练飞机，42 辆坦克，34

台步兵作战汽车,139 门大炮,2500 支自动步枪和 27 车皮的弹药。战斗人员将不再会缺乏武器和弹药了。

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在 1992 年承认撤销车臣 - 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和组建两个新的共和国——车臣和印古什。

车臣共和国银行的账号被解冻,以便拨去退休金。杜达耶夫政府得到向自己的公民发放国外护照的权利。这就意味着杜达耶夫政权在莫斯科得到了事实上的承认。

莫斯科的政治家们关于车臣的所有想法可以归结为空想着用一个听话的政府来取代杜达耶夫的坏政府。

这样的机会很快出现了。就像在莫斯科一样,在格罗兹尼一开始就出现了权力的对抗。叶利钦在和最高苏维埃进行着一场使人精疲力竭的战斗。杜达耶夫也和自己的议会争吵起来,但是行动更为坚决。当有人试图杀害他时,他解散了议会,实行总统的直接管理。

杜达耶夫的反党派退到了上铁列克区和乌鲁斯 - 马尔塔诺夫区。12 月,反对派建立了车臣共和国临时委员会,领导它的是来自苏呼米的原警察、上铁列克区的地方行政长官乌马尔·阿夫杜尔哈诺夫。他表示准备让已起来造反的共和国服从于莫斯科。

1994 年开始明了,任何人也无法控制的这块土地正在变成恐怖主义的肥沃土壤。

所有能武装的人都武装起来了——或者是手持武器来谋取生计,或者相反去防御强盗。俄罗斯人的处境最糟,他们无处得到武器,而且他们最容易成为刑事犯的牺牲品。

5 月,不同的车臣匪帮曾三次在矿水城区劫持公共汽车。他们要求赎金和提供把他们送回车臣的直升飞机。他们的要求两次得到了满足。第三次,内务部队司令阿纳托利·库利科夫下令解人质。这次行动并不很成功,直升机被击毁,一名恐怖分子和五名人质被打死,其他人受了伤。

“一开始就很明显 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被匪帮占领了。”时任联邦反间谍局副局长叶夫根尼·萨沃斯季亚诺夫对我说。“人们试图和杜达耶夫进行斗争，但是只要回想一下当时俄罗斯的政权是什么样的，也就完全明白不可能有所作为。”

这种情形如传染病般蔓延到整个北高加索。北高加索各族的人民代表大会变成了一支侵略性的武装力量。车臣彻底成为匪帮的地盘，假造的银行证件（报单）和诈骗犯从那里源源不断地流出。这场瘟疫病开始按照最坏的脚本发展。它有时像恶性肿瘤，先是转移到整个高加索，后来又转移到俄罗斯腹地；有时像急性炎症病灶，侵害了整个机体。但是两年多来谁都没有发现车臣问题。一切都按部就班，只是在 1994 年才开始着手处理车臣问题。

40 辆坦克开往格罗兹尼

但是鲍里斯·叶利钦依然毫无兴致地按照“剩余原则”处理北高加索事务。谢尔盖·菲拉托夫对我说：

“1994 年时还可以预见一些情况 整理出自己的看法 但主动性还是来自下面。那甚至不是来自于我们自己这里，而是来自于车臣本身。我们支持了阿夫杜尔哈诺夫，但这是他自己来找我们，不是我们把他拉过来的……”

当然，反对派的那些领导人也都是一些十分可疑的人。领导着一支最大的队伍的鲁斯兰·拉巴扎诺夫是空手道教练。1990 年他因为杀人而被逮捕，但他坐牢的时间不长。因为 1991 年 11 月格罗兹尼监狱里发生了一场暴动，原来的囚犯被组建成一支队伍，加入了总统近卫军。但是鲁斯兰·拉巴扎诺夫的行动并不顺利，忠于杜达耶夫的部队击溃了他的人马。后来拉巴扎诺夫本人也死去了。

阿夫杜尔哈诺夫甚至极力和拉巴扎诺夫保持距离，当面

称他为“匪徒”。结果证实正是鲁斯兰·拉巴扎诺夫开始靠人质来捞钱，他为此获得了大批赎金。

指挥另一支队伍的是比斯兰·甘塔米罗夫。苏维埃政权时期，他在警察局里工作，是最先投靠杜达耶夫的人之一，1992 年被任命为格罗兹尼市长。后来他们反目了。

甘塔米罗夫领导了反对派的联合武装力量，并担任了车臣共和国的联邦权力执行机构领土管理局的副局长。

反对派组建了共和国临时委员会，领导它的是乌马尔·阿夫杜尔哈诺夫。他请求叶利钦总统承认临时委员会是惟一合法的政权机关。

莫斯科承认了临时委员会，并拨给它 1500 亿卢布用以支付工资和退休金，从而把人们吸引过来。还给阿夫杜尔哈诺夫派来了军事顾问以领导其军队。

“当反对杜达耶夫的情绪开始逐渐成熟的时候，当时在总统办公厅工作的瓦季姆·佩切涅夫对我说，我为总统准备了一份材料，其中制定了摆脱危机的一些方案。我们认为让军队进入是最危险的方案，因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人们团结在杜达耶夫的周围并会出现危险，即联邦中央和联邦主体之间的纯粹政治性冲突将上升为车臣人和俄罗斯人之间的种族政治冲突，这种冲突是难以解决的……”

当时的俄罗斯总统下属的分析中心副主任埃米尔·派因想出了两个车臣问题的方案。他回忆说：

“想法是这样的：一个车臣，两种制度。车臣共和国还保留（但是将有一些得到人道主义援助的区，北部的三个区）在那里建设医院和幼儿园，发放退休金。进行选择的时候到了，您可以选择更喜欢的——是在独立的车臣过一无所有的生活，还是留在联邦体制下过有保障的生活……”

“至于军事援助，它应该有限定性，即为了自卫，而不是为了进攻格罗兹尼。”瓦季姆·佩切涅夫继续说。“文件已经起

好了，而且总的来看也得到了总统的首肯。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最坏和最危险的方案。我不知道是谁作出的这种决定，尽管当时我在总统办公厅工作，而且未来车臣的首脑多库·扎夫加耶夫还是我的下属。”

联邦反间谍局说服了叶利钦，即通过反对派之手就可以解决车臣问题，似乎无需军队干预。车臣人自己会整顿好共和国的秩序并会请求莫斯科将他们置于保护之下。特工部门的人都是游说高手，许多政治家陷入窘境就是因为相信了他们所允诺的可以悄无声息地解决好最棘手的问题。

1994年夏天，在莫斯科的“北京”饭店里，一些散居各地的车臣人的著名代表人物见了面。这些人早就离开了车臣，打算为自己的同乡做些什么。当时议论的是联邦政权准备推翻杜达耶夫政权，并号召所有的车臣人都返回家园，拿起武器恢复家乡的秩序。

11月的后半个月，反对派向杜达耶夫的部队发起攻击。当时反对派从联邦军队那里得到了装甲运输车、直升机和40辆坦克。

坦克手是联邦反间谍局的行动人员从莫斯科军区的部队中招来的。战士们形式上从武装力量的队伍中复员，并且和他们签订了《在紧急情况下使用作战设备》的假合同。为军官们办理了休假手续。这些合同兵被送到奇卡洛夫斯克机场，他们从那里飞到莫兹多克（北奥塞梯的一个机场）然后再用直升机或者直接用装甲车把他们送到反对派控制的地区。

这项行动的准备工作的很糟糕，其结局也很悲惨。40辆坦克和1000名步兵去占领城市显然兵力不足。

11月26日，得到坦克和联邦步兵支援的反对派队伍进入格罗兹尼。阿夫杜尔哈诺夫急匆匆宣布，共和国的权力属于领导它的最高苏维埃。但是就在当天反对派的队伍被忠于杜达耶夫的作战人员击溃。

坦克很轻易地就开到了市中心，但它们在那里被榴弹炮消灭了。这些不幸的坦克兵孩子被俘，并承认是联邦反间谍局把他们派到车臣来的。车臣人请来电视记者，为的是拍下被俘士兵和军官们供认的情景。

国防部长巴维尔·格拉乔夫公开否认这些人是自己的部下，他宣布说这些人并没有列入俄罗斯武装力量人员的名单。他的所作所为就像是约定好了的：确认这一切都是车臣反对派自己干的。但是他做得太恶劣了，在艰难的情况下指挥官是不能抛弃自己的战士的……

被投放到车臣去的联邦军队的战士们没有听到任何解释，他们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要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作战。难道就不能进行谈判吗？他们也怀疑在不利的情况下他们还可能听凭命运的摆布。这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第一次车臣战争会惨遭失败。

联邦反间谍局长谢尔盖·斯捷帕申与其他强力部门的部长不同，当时他没有藏到别人的背后，而是承担了在格罗兹尼发生的这场悲剧的责任。他敢于承认被俘的就是俄罗斯的士兵和军官，而且为解救他们尽其所能。为了让他们有权得到退役金，按照他的指示，所有突袭格罗兹尼的坦克手都被列入反间谍局的编制内。牺牲的坦克手后来也被列入，为的是让他们的亲人们领到退役金。

时任斯捷帕申副手的叶夫根尼·萨沃斯季亚诺夫后来解释说，他曾建议从前苏联的其他共和国招募人们来搞这次特别行动，那里到处都是当过兵的人。他说，那样就不会有这些不愉快的事了。

整个事件表明，不能把解决政治问题的事情交给特工部门和军人去办。他们保证能很轻松地把一切都安排好，但却会把事情搞砸。在自己的领土上使用雇佣军，显然，这不会得到任何好结果。

鲍里斯·叶利钦和巴维尔·格拉乔夫

在莫斯科 叶利钦总统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 他没有让一个车臣的什么将军跨进门槛，却被他搞得一鼻子灰。

11月26日之后，叶利钦总统全神贯注地着手车臣事务。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听从了‘鹰派’的建议 要求立即把叛乱镇压下去。这又是一个错误。

当时在那个阶段可以找到更合理的出路：沿铁列克河部署部队 能够控制反杜达耶夫的势力所在的地区就行了 再尝试着在车臣其他地区的周围建立起隔离带。这就要求缓慢而讲究方式的工作。但是叶利钦一心渴望着复仇。周围所有的人也劝总统，告诉他把杜达耶夫镇压下去并不复杂。

当时安全会议通过了在车臣全面展开军事行动的决议，计划用两三个星期完成该行动。军方的报告说，车臣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对手 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武装匪徒 在进攻的军队面前他们会望风而逃。

国防部长巴维尔·格拉乔夫命令在总参谋部作战局成立一个车臣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由总参谋部作战总局副局长阿纳托利·克瓦什宁将军领导。

在莫兹多克，高级将领们召开了一次会议。在那里参加这次会议的联邦边防局局长安德烈·尼古拉耶夫将对国防部长格拉乔夫说，行动还没有准备好。关于此事他后来也向叶利钦汇报了。尼古拉耶夫将军可以开诚布公地这么说，因为他不隶属于格拉乔夫。但是人们没有听从尼古拉耶夫的意见，因为其他人都保证会很快成功。

关于作战行动的决定在安全会议上得以通过。参加这个会议的除叶利钦外 还有巴维尔·格拉乔夫、司法部长尤里·卡尔梅科夫 他好像是惟一反对作战行动的)外交部长安德烈·

科济列夫、联邦边防局长安德烈·尼古拉耶夫(缺席)对外情报局长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国家杜马主席伊万·雷布金、联邦反间谍局长谢尔盖·斯捷帕申、紧急状态事务部长谢尔盖·绍伊古、联邦委员会主席弗拉基米尔·舒梅科等。

“究竟是怎样通过开战决议的？”我问格奥尔吉·萨塔罗夫。

“我知道，当时制订了几种不同的行动方案。我所知道的那些方案看来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们不会引起全面战争。而当突然得知军队已经进入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我写了辞职申请，但是同事们制止我说：‘你走，他也走，谁还给总统提建议啊，将来会怎样呢？’他们把我留住了。”

“但是，像叶利钦这样一个有经验的人怎么会陷入这种冒险的事呢？”

“对一个州委第一书记来说这种心态是正常的。”格奥尔吉·萨塔罗夫说。“他知道我们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好的。如果把你放到州委书记的位置，那么你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有人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当然，在车臣那里还保留着几支步枪。但是，其他的一切还都在我们手里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怎么，我们在两天内还搞不死他们吗？’你能不相信他吗？难道叶利钦还能想别的吗？而且我们所有的人对此都深信不疑……”

安德烈·尼古拉耶夫将军认为：“在 1993 年的著名事件之后，格拉乔夫需要一场小小的胜仗，这场胜仗会证明他作为一个军人还是很可靠的，也会给他提供可以成为俄罗斯第一元帅的机会。”国防部长于是宣布：“如果军队下手，只用一个空降团就可以在两个小时里解决所有的问题”。

我问尼古拉耶夫将军：“这就是说，格拉乔夫是 1994 年军事解决的发动者？”

“我想，政治定调还是来自叶利钦，”尼古拉耶夫回答说，